

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 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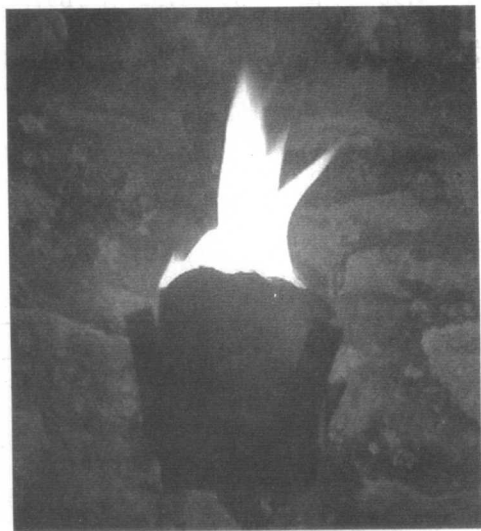
崔维孝 / 著



中華書局

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 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

崔维孝 /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 1579 ~ 1732/
崔维孝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ISBN 7 - 101 - 04836 - 6

I . 明… II . 崔… III . 西班牙—海外传教组织—
传教事业—研究—中国—1579 ~ 1732 IV . B9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113 号

书 名	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 - 1732)
著 者	崔维孝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frac{3}{4}$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836 - 6/K · 2076
定 价	36.00 元

序

一

关于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当欧美学者已经拿出一部又一部既具宏观史识又有坚实史料的煌煌巨著时,中国学者才蹒跚起步。从起步来讲,中国比欧美晚了近百年。当然,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一天然的分水岭,即外国学者多长于西语文献而获得葡、西、荷、法、意、英诸国馆藏欧洲语系档案资料,完成了许多极具学术分量的专著和论文,也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中国天主教史家,如费赖之(L. Pfister)、德礼贤(P. M. d'Elia)、裴化行(H. Bernard)、荣振华(J. Dehergne)、魏特(A. Vâth)、高龙盘(A. M. Colombels)、古柏尔(Nöel; l Gubbels)、劳内(A. Launay)、托玛斯(A. Thomas)、玛乔蒂(F. Margiotti)、冈萨雷斯(J. M. Gonzalez)等;而中国学者则多从中文文献(包括史书、文集、笔记、档案、谱牒、金石、碑刻)中收集资料,以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展开对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明清士大夫阶层中中国基督徒研究颇深,其中尤以陈垣、方豪、阎宗临诸先生甚为突出。近年来,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承继陈、方二先生的传统,在深入发掘中文史料,研读史料与求证教史的诸多方面显露出明清文献深厚的根柢与不同凡响的见解。中国大陆在陈、方、阎之后,曾出现相当长时间的断层。上世纪80年代后虽

一度有振兴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之壮举,但限于国内的环境,这一领域中出现的大批成果,除张铨、林金水、韩琦、李天纲及徐海松等少数几位先生的著作有所创新外,大多数作品或趁时应世,或空泛因袭,可取者实在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以许理和(Erik Zürcher)及他的学生杜鼎克(Ad Dudink)、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为代表的欧洲汉学家开始大规模地向基督教史中文文献领域进军,边整理出版,边发表研究成果,做出的成绩令人吃惊,足以超迈陈、方时代,令中国的同行们“汗颜”。

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中国的专家应走在这一学科的前沿,这应是理所当然且更应是义不容辞的,而要走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前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必不可少。一条腿必须站在坚实的中文档案文献的基础之上,另一条腿则必须迈进浩瀚无涯的各种西语档案文献的海洋之中,缺一不可。中国学者能深入到西方语言文献中展开研究者本来就不多,特别是在西语小语种上则更具弱势,如拉丁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及西班牙文,而以上四种语文又是中国早期天主教史原始资料的最主要源头。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大都集中在耶稣会之上,而对方济会、道明(多明我)会、奥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及教廷传信部在中国的传教则鲜有人问津。虽然,在中西文化交流贡献与对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层面上耶稣会确实比其他来华天主教修会影响更大,但作为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诸多方面以及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入与渗透(特别是边远地区)层面而言,方济会、道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活动,其意义则远远高出耶稣会。这一点是我们的教史著作中根本未曾触及者。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者研究耶稣会的著作“汗牛充栋”,而研究其他修会则基本阙如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精通上述外语的人不来研究教会史,而研究教会史的中国学者尚未能熟练掌握上述语

种。这一历史的遗憾始终横亘在中国学者难以言表的情结之中。

所喜的是，春天冰河的坚冰已经开始松动，一批熟练掌握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的中国专家已投入到中国天主教史及中西交流史的研究之中，如金国平、吴志良等，还有一批研究教会史的青年学者则已进入到一些无人问津的小语种文献档案之中，如台湾的李毓中，大陆的张先清。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国学者已在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中有自己的可喜成果。这里所要推介的崔维孝博士的《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就是这一批涌现的新成果之一。

二

在介绍崔维孝博士之前，还有一位同我及崔博士均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必须谈到，他就是香港天主教方济会圣文德堂的韩承良神父。韩承良神父祖籍山东，于1930年12月25日出生，父母均为天主教信徒。韩神父早年在西班牙加入方济会，晋铎后赴罗马安道大学进修。1959年考取《圣经》神学博士学位；1961年在西班牙方济会联合大修道院任教，讲授《圣经》。1967年回香港参与思高圣经学会的圣经释义工作。自1979年起在中华方济会省任秘书三年、省会长六年、香港区会长三年。1992年10月调赴马德里，被总会长委任，负责方济会中国传教历史编辑委员会工作。我知道，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圈子里，大部分中国学者是不认识韩神父的。但是，韩神父在上世纪90年代后对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方济会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确实不应该被人们所忘记。我之所以认识韩神父，乃缘起于神父1993年在台湾高雄《善导周刊》上连载的一篇文章：

《中国礼仪之争的来龙去脉》。由于是发表在教会报刊上,全文没有一个注释。但是,我读完此文后,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篇极具分量的学术论文。不足三万字的篇幅闪烁着无数学术亮点,大批量的闻所未闻的新资料在文章中被披露。凭我的学术敏感,我估计这是一位对中国方济会档案文献极为熟悉的专家,而且一定是一位精通拉丁文、西班牙文及意大利文的学者。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寻觅到这位尚不为学术界所知的韩神父。由于我有机会经常出入港澳台等地且多与教会学者接触,2001年夏,我终于在九龙蒲岗的一个小教堂内见到了韩神父。此时他已退休,身体很虚弱,但人极谦和。他见到还有对他的学术成果如此关注的人,表现得异常兴奋,不顾自己连喘气都有点吃力的身体,同我长谈了足足有四个小时。他不仅将他有关方济会历史的几部著作(包括他编辑、翻译的《纪念孟高维诺总主教来华七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文集》)赠送给我,还要将他架上珍藏的一套 *Sinica Franciscana* (崔维孝译作《方济会士中国书简汇编》)10卷15册全部送我。我实在感到惭愧,初次见面,怎么能接受如此贵重之赠礼呢?我虽然谢绝,但说实在话,我是非常想要这套书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Sinica Franciscana* 的原件。虽然我对书中的内容除偶有插入的几张中文档案原件外,可以说是一字不识,但我还是深深知道,这部巨著在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此书除1929年出版的第一卷是元代来华方济会士的书简汇编外,其余9卷14册,均是明清以来方济会士的书信及中国方济会的年度报告。当时韩神父还告诉我,由于西班牙方济会的人力、财力有限,这部书还没编完,第十五册仅编到乾隆十三年(1748),而其中九、十两卷四册即是由韩神父亲自编辑整理。据中文档案可知,乾隆中后期正是意大利方济会士在我国西北地区(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秘

密传教的活跃时期，我十分关心地问，乾隆十三年后的方济会档案什么时候能编出来，韩神父摇头叹气说：“恐怕目前是没有办法整理出来。”

这已是四年前的事情了，但韩神父那不高、微胖、步履蹒跚的身影却始终在我的忆念之中。我当时想请他来暨大讲学，他说，等他身体好一些，一定要来广州看我。可是，这一别，竟是我与韩神父的永诀。去年冬天，我听到一位香港朋友告诉我，韩神父已乘鹤仙逝。这位中国方济会传教史研究的拓荒者、奠基人已悄悄地离开了我们，静静地躺在港岛跑马地的墓园之中。

就是在韩神父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利用中文档案及郎汝略(Vitalis Lange)、文德泉(T. M. Teixeira)、李少峰及韩承良诸人所公布的方济会资料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篇方济会在华传教史的文章《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后来在北京召开的“相遇与碰撞——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与此同时，我在一次澳门的国际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崔维孝博士，他当时刚刚完成澳门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在会议上，他那熟练精道的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的能力深深吸引了我，我知道，这就是我长期寻觅的研究早期中国天主教史的人才。我们几乎是一拍即合，崔博士当时既希望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亦想通过自己的外语专长进行一些学术研究，我则希望崔博士以其外语专长来推动和促进我们正在展开的明清天主教史研究。这一年，我真是大丰收，在澳门收了两名令我极为满意的博士研究生，其中之一就是本书作者崔维孝。我记得崔维孝考博时考的是葡语，当时出题的是“东方葡萄牙学会”派到暨大任教的葡籍老师，考完后，葡国教师给崔的试卷评分为“99分”，他后来对我说，在崔的试卷中挑不出一丝一毫的错误。本该给100分，但不好意思，就给了99分。讲这个小故事，则完全可以反映崔维孝

的葡语水准。

崔维孝考进暨大攻博之后,我几乎是不加考虑就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定题为:明清之际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我认为他就是这一课题最为恰当的人选,并向他推荐了 *Sinica Franciscana* 这部方济会档案文献集和韩承良神父,希望他多向韩神父请教学习,以获得更多的资料和指导。后来我经常听到崔和韩学术交往的讯息,崔亦经常奔走在港澳两地之间。韩神父不仅对崔给予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而且还和崔合作翻译了《方济会传教士南怀德神父生平》一文,于2003年12月刊登在《澳门历史研究》第二期上。今天,崔维孝博士关于中国方济会史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正式出版,我想,这应是我们两人对韩神父一种最好的纪念。

三

毫无疑问,这部近40万字关于中国方济各会早期传教史的学术专著,是目前中国学者的天主教史研究著作中最具特色的一部。

特色之一:在明清天主教传教史的研究中,学者们最感兴趣的是入华耶稣会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很多人的认识中,入华天主教只知耶稣会,而不知其他。作者以十分丰富的资料及历史研究工作者严谨的逻辑思维和细密的论证完成中国第一部方济会在华传教史的学术专著。在此之前,中国港台学者虽有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及韩承良《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两种关于方济会传教史的著作。前者应是一简单的介绍,全文共63页,约四万五千字,而且是从13世纪写到20世纪,故各相关部分内容十分简略;韩神父

的著作全书虽有10万字左右,但该书仍为中国方济会通史类型著作,涉及到西班牙方济会的早期传教部分,亦不过两三万字。虽然上述两位神父的著作都是依据方济会档案文件写成,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著作所征引文献档案均没有注明出处,因此,这两部著作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故从这一视角而言,崔著就成为中国学者中惟一一部关于中国方济会传教史的学术专著,填补了我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特色之二:该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大规模利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原始档案完成的西班牙方济会中国传教史的专著。西方学者治天主教史通葡、西语文者甚多,而在中国学者中则属凤毛麟角。方豪神父具有相当的外语能力,亦仅局限于拉丁文和法文,于西、葡语文则不通;还有些学者虽略通西、葡语,但要大面积阅读和翻译西、葡文献档案却仍然困难。作者本身是西班牙文专业出身,后又从事多年的葡萄牙语教学和翻译,在西、葡两语的文献解读与翻译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在韩承良神父的指导下,又获其拉丁文与意大利文的帮助(因为在西班牙方济会档案中还夹杂不少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故在崔著中解读与翻译方济会中国传教早期文献档案的准确性是令人放心的。正因为如此,崔著呈现出来许多长期为人们忽略的西班牙文献中隐藏的明清历史素材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惊喜。有些是我闻所未闻、几乎已湮没的中西交往的史实,有些则与中文文献档案相互印证。总之,崔著中公布的大量的西班牙文明清天主教新史料,为我们认识明清天主教史与同时期的中西交往史又增加了许多“新东西”。

特色之三:如果说利用葡、西语文资料研究明清方济会本是作者的专业并不为奇的话,那么这部著作中从《明清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徐家

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熙朝定案》、《圣朝破邪集》等书中挖掘出来为数不少的方济会中文档案,且与葡、西文档案相互印证,并解决一些问题。如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方济会领取传教“印票”的问题,几份中文档案与西文档案相互证补,将这一问题辨析得十分清楚;又如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利用《熙朝定案》的中文记录与西文档案互证,当时康熙两次分别接见方济会柯若瑟(Ioseph Osca)、利安宁(Emmanuel a sancto Ioannes Baptista)神父的过程与细节,中西档案记录完全一致。特别是本书利用新发掘的石铎禄(Petro de la Piñuela)神父中文书籍《本草补》的资料来论述方济会对西方医药在华的传播中所作的贡献,更是发人之所未发。石铎禄神父的《本草补》是目前所见惟一一部由西方传教士用中文写成的中国药物学著作,该书不仅在康熙时期即有刻本,到乾隆时更在中国药学界广为流传。乾隆时著名药物学家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时,即有九处征引到《本草补》一书。崔著不仅看到此书乃方济会中国传教史上惟一的科学著作,而且对这部本不应该出现在方济会士笔下(因为方济会来华的目的“原为救人灵魂,非为肉躯计也”)的科学著作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本草补》一书或早已为中医药学界所知,但以方济会在华传教史的角度对这一部极为珍贵的方济会科学著作展开深入研究,崔氏为开创者。

如果我们仅以上述几点特色来评判崔著,就未免还是会流于空泛。我读完此书后,印象最深也是全书最闪光之点有几处:

首先,第四章《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重建中国教区》。这一章共37页约4万余字。整章浓墨重彩,挖掘甚为丰富的西文资料,十分细密周全地叙述了方济会于17世纪后半段在广东地区的传教与发展,特别是对澳门药房与广州医院创建的论述中,对

医院的规模、治疗的对象、资金及药品的来源及医院内主持的医生逐一进行考述,以雄辩的史实证明,方济会广州医院是我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西医院。而崔著中描述的方济会在广州、惠州、潮州、顺德创立教区,并在顺德建立总铎区。在雍正禁教前,顺德县城内建有两个教堂,周围45个村庄中还有5所圣堂,每个村庄均有天主教友。这些史实,弥补了我们对明清广东天主教认识的不足,从而也解决了为什么《澳门纪略》中记录乾隆时广东各县民人赴澳门进教,“惟顺德紫泥人为最多”之缘由。我读过多部研究广东天主教史的论著,几乎无一人涉及方济会广东传教之史实。从近年发掘的中西文资料,清前期广东天主教史极为复杂,除明末的耶稣会外,清前期方济会、道明会、奥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及教廷传信部无不涉足广东。要搞清明清广东天主教的历史,不广泛收集释读与利用上述各修会的多语种史料,编纂广东天主教史则是空话。

其次,第六章《方济会传教士与“中国礼仪之争”》。我们知道“中国礼仪之争”挑开序幕的主要人物就是方济会的利安当(Antonius a santa Maria)神父。1666年的广州会议上,被放逐的25位传教士都在包括承认中国礼仪问题在内的42项决议上签字,持反对意见的仅利安当一人,故一般都认为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方济会是站在耶稣会的对立面,反对中国礼仪者。而崔著以丰富的资料,翔尽的史实论证了方济会自第二度进入中国后,关于“中国礼仪”立场已开始转变,而推动这转变的最重要的人物则为方济会的利安定(Augustinus a sancto Paschale)神父与南怀德(Michael Fernandez)神父;利安定神父的转变表明方济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做法,不仅有异于耶稣会,亦不同于道明会”。而到南怀德时期,方济会则完全倒向耶稣会一边,站在耶稣会同一立场上,遵守利玛窦所创立

的规矩,以适应中国的传教。文章全部以西班牙方济会原始档案资料为凭据,丝丝入扣,步步为营,层层论证,将“中国礼仪之争”的最重要角色方济会从利安当时代的坚决反对,到文度辣(Bonaventura Ybanez)时代开始变化,到利安定时代部分改变,最后到南怀德时代完全倒向耶稣会一边,表示对中国礼仪的尊重和承认。在“中国礼仪之争”这一老问题上,作者并没有像现今的多数著作一样“炒冷饭”,而是以自己的材料,自己的论证及全新的角度,使我们对“中国礼仪之争”又增添了不少新的认识。

再次,2004年钟鸣旦教授在一本著作中的导言称:“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经济背景目前还是一个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领域。这个领域应当探究以下问题:传教士从何得到经济资助?他们从事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基督教最主要的保护人是谁?它从士绅阶层得到多少支持?中国的基督徒对慈善机构作了哪些贡献?财产问题如何解决?”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经济问题称之为是“一个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领域”只能证明钟教授对我国天主教研究并不十分清楚,我本人于2001年在《世界宗教研究》发表《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传教士经费之来源》,此文即是继康志杰《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一文后规模更大、使用中西文献档案资料更多的一篇基督教经济史论文,全文近3万字。更何况1999年于鲁汶出版的高华士(Nöel Golvers)《耶稣会传教士鲁日满在常熟——1674—1676年之账本及〈鲁日满行谊〉研究》一书则更是最为出色,最为扎实的大部头基督教经济史研究专著。钟氏的学术评判虽不十分准确,但提醒我们,基督教经济史应引起我们更高的重视。崔著在这一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在全书的第七章内安排专节讨论方济会在华传教的经费问题。作者以翔实的西班牙文献档案资料分析了方济会不同时期的经费来源,而且透过方济会的经费来源可以看出,西班牙国王对方

济会在中国传教的重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在30年中向中国方济会捐赠了8万块银比索,推动方济会中国传教事业的大发展,以致方济会在全国修建了56座教堂,成为了入华天主教修会中仅次于耶稣会的第二大修会。作者利用西班牙文档案中公布的各种数据和史实,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基督教经济又增添了不少内容,也弥补了中国基督教经济史研究中的不足。

四

早些年的欧洲汉学家都喜欢谈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国内亦有不少学者跟进。在他们的视野中,似乎基督教教会史及传教史的研究已经过时,或者说教会史及传教史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研究,甚至将传教史、教会史的研究完全归结于一种“欧洲中心观”的产物。我很不赞成这些将事情叙述复杂化而结论上又是十分简单的理论分类。我并不想对“欧洲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的区分与转换发表意见,更不想在基督教研究中的“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变换中做文章。但我坚持一点,任何历史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是取决于材料。虽然在我们现今的天主教史研究中存在着以西方材料为主和以中文材料为主的两种现象,但这一状况的存在是由于研究者们学识能力的局限所造成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处理方式,而不是使用东、西方材料完成的天主教史研究著作的东、西方人有意识去制造一种“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因为早期的西方天主教史研究者大都不通中文,而中国天主教史研究者掌握和运用西方语言的能力实在有限。故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能真正将16—18世纪有关东、西方各类语言的天主教史资料融会贯通,互证互补,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早期天主教史做出一个较为系统、清晰的认识。

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像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许理和、钟鸣旦、杜鼎克这样一批精通中西语文的基督教史家,在中国却尚未产生,这是不争的事实。要培养和训练出一批能同时充分利用拉丁、意、葡、西、荷、法、德、英等国文献的中国专家,我估计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像崔维孝博士这样精通部分西方语言的中国专家投入到天主教史研究中并不少,但还远远不够,一是掌握的语文种类太少,二是在各种语类文献中的开掘和翻译不足。虽然我们不断地强调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要将中、西文史料同时并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中最为主要的史料构成是西文多语种史料,而不是中文,中文史料往往只是在研究中国基督教徒的身份、履历,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的认识及反教运动的过程等几个方面表现尤为重要;在很多修会的在华活动中,几乎无中文资料记录。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中,传教史的研究及对各种西方语言文献档案的发现和利用仍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只有通过一个个地区、一个个修会、一次次教案的专门研究,才有可能将这些沉寂湮没在梵蒂冈、巴黎、马德里、里斯本等地的各修会档案馆多语种西文档案发掘出来。基本的传教事实都搞不清楚,基础的文献史料绝大部分还不为研究者认知,就奢谈什么“理论模式”、“转换范式”,我很担心,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很有可能重蹈我国上一世纪50年代后中国历史研究之覆辙。这种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教训,不应重演,不管是西洋式,还是中国式。

崔维孝博士的这部著作仍然是属于传教学的范畴,但我一点也不觉得他的研究过时。读了这部书,不仅没有过时感,而且感觉到这部严谨扎实的研究著作给中国的学术界留下的新东西不少。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将叙事和分析比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16—18世纪西班牙方济会在中国150余年的传教活动清

楚地呈现给我们,这应该是崔博士的贡献。当然,崔著绝非无瑕之璧,作者毕竟仍是进入史学领域时间并不太长的新手,在很多叙事背景及史料选择上还不能完全“到位”,存在着明显的拘谨和稚嫩,文字及叙述上的洗练还不够,等等。但这一切均不影响这部专著出版的价值。崔维孝博士在中国早期天主教史研究中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衷心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步。我相信,利用西班牙语文献研究中国天主教史,崔博士还会有他令人喜悦的第二步、第三步……,不仅是方济会,还有道明会、奥斯定会。

汤开建

2005年9月10日教师节

于广州暨南大学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目 录

序	1
绪 言	1
第一章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形势(1579—1670)	
.....	17
一 耶稣会入华传教	21
二 托钵修会入华传教	25
三 入华意大利方济会士	47
第二章 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艰难的中国之行	61
一 西班牙传教士的中国初行	62
二 西班牙传教士继续前来中国	86
三 西班牙传教士北京之行与福建教难(1637)	92
第三章 方济会中国教区开拓人利安当	112
一 利安当一进中国江西/南京之行	113
二 利安当二进中国福建传教	117
三 济南开教创建山东教区	125